

### 【学习要点】

1. 元明是继秦汉、隋唐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统一时期，规模空前的政治统一和民族迁徙融合，使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

2. 中央政权通过设置军政管理机构、册封任命地方首领等措施，继续行使对西域的管辖权。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等地方政权都认同中央政权。

3. 大量汉人、蒙古人、女真人、党项人与畏兀儿人交错杂居，相互影响，民族融合再现高潮。这一时期，有大量蒙古人融入到畏兀儿人中，为畏兀儿补充了新鲜血液。

4. 元朝时期新疆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继续发展，大批蒙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从游牧转向农业定居，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依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交流。

5. 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明的浸润下都有了新的发展。大量畏兀儿人迁居内地，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他们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

6. 多种宗教继续在新疆地区传播，16世纪以后，新疆地区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多种宗教都沿着中国化方向继续发展。

## 第一节 规模空前的政治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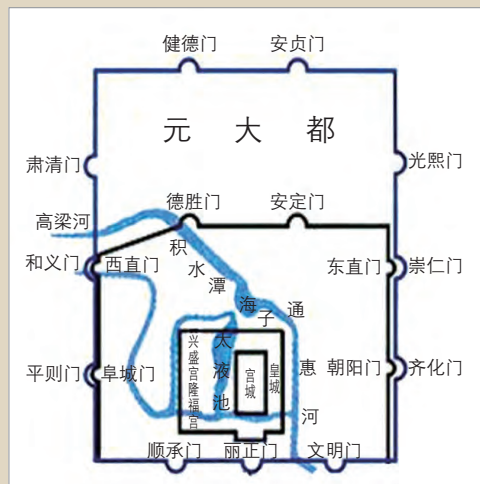
元朝政治统一，疆域辽阔，中央与地方、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之间的联系空前加强。规模空前的政治统一局面推动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迁徙，形成了元朝境内广泛的民族杂居局面，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朝打破了传统王朝的“夷夏”观，确立“中国”为统一王朝的统称，推动中华整体观念深入人心。

### 一、元明的兴衰

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政权，被尊称为成吉思汗。之

## 知识卡片

元大都为元代都城，城址位于今北京，由元代科学家刘秉忠规划建设。刘秉忠在规划元大都的布局时，按照《周礼·考工记》“九经九纬”“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礼制，把街道像棋盘一样进行规划，并把《易经》中的阴阳八卦、天地相合都运用到大都的建造中。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后，蒙古开始向邻境发动大规模战争，先后攻灭西辽、西夏、金。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大汗位；1271年，改国号为元，次年定都于大都（今北京）。1279年，元朝攻灭南宋，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元朝前期和中期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后期由于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加剧，1351年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1368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军推翻元朝，建立明朝。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派兵消灭了陕西、山西、四川等地对抗势力，并深入漠北追歼元朝残余势力，于1387年基本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将都城迁至北京，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略和治理。明永乐年间，明朝政局稳定、国力强大，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鼎盛时期。明朝末年，活动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不断发展壮大，对明朝的统治构成了极大威胁。同时，明朝政治腐败越发严重，国家财政危机甚重，朝廷不断加派赋税，民众不堪重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1644年，明朝灭亡。

## 二、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全国性的统一王朝。在建立政权的同时，元朝统治者继承了汉唐以来的正统观念，参照中原历代王朝的统治方式，逐步确立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建元中统，诏告天下：“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

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sup>①</sup>明确强调了新政权作为中朝正统、“天下一家”的地位，并以“天下宗主”自居，多次表明他们的统治是“天命有归”。“华夷之别”日益模糊，夺得一统天下的“正统”地位，成为各民族统治者在政治理念上的共识。同时，元朝全面推行汉法，改革蒙古对汉地的统治方式，博采汉族士人建议，仿效中原传统制度，确立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基本上奠定了元朝的政治体制。特别是行省制度的实施，巩固了元朝的统治，是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对后来的国家政治制度影响深远。

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后，认为“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元朝统治者“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表明明朝统治者承认元朝入主中原的合法性，肯定元朝统一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正统的延续，打破了传统王朝的“夷夏”观。明太祖朱元璋不再强调“华夷之辨”，而是称“华夷一家”，声言“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sup>②</sup>，又强调“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sup>③</sup>。



① （明）宋濂：《元史·世祖纪》，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65 页。  
② 官修：《明太祖实录》（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1041、404、1801 页。  
③ 官修：《明太祖实录》（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1048 页。

其后继者明成祖更加以发挥，宣称：“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sup>①</sup>“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sup>②</sup>这充分说明，经过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又经过元朝大一统的巩固与发展，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明朝以前，只有各个王朝名称或以家天下为代表的政权称号。从明朝开始，统治者对国家的基本认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被明朝统治者认定为国家通称，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而且包括曾经称为“四夷”的少数民族区域，凡是秦、汉、隋、唐、宋、元至明已经进入统一王朝行政区划范畴的区域均为中国的国家疆域，而国号“大明”仅指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而已。“中国”指称超越了“夷”“夏”民族分野，超越了汉唐等王朝体统，是包含了我国历代王朝疆域内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通称。

元朝疆域辽阔，北至西伯利亚，南抵南海诸岛，东北到今库页岛，西北达到新疆地区、中亚地区。为了对辽阔的疆域进行有效治理，元朝统治者根据各地区的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在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等地区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元朝在中央设立中书省，掌管全国行政事务，并直辖“腹里”（包括山东、山西、河北），其他地方划为十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其中的岭北、辽阳、甘肃、云南、湖广等行省的管辖范围都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元朝在漠北地区设岭北行省，在东北地区设辽阳行省，在西域设别失八里行尚书省等机构。另外，元朝设置宣政院统辖吐蕃地区，从此，西藏正式成为中央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设立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和琉球。

我国历代疆域的发展都以陆地为主，并在元朝达到巅峰。明朝疆域最广时，东北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西北至新疆哈密，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东南至海并及海外诸岛。虽然明朝的直辖疆域不能与元朝相比，但海权思想的出现，进一步开阔了我国对疆域的认识。15世纪初，明朝经济逐步繁荣，国力雄厚，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强国。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期，“锐意通四夷”，形成向北方、东北、西北地区发展的势头，并远涉海外。1405—1433年，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彰显了中国和平友好、和谐相处的文化精神，也标志着中国海权思想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海洋构成了我国大一统国家的利益所在，中央王朝开始加强对海洋的控制和利用。

① 官修：《明太宗实录》（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407页。

② 官修：《明太宗实录》（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33—534页。



## 资料链接

15世纪初，明朝经济逐步繁荣，国力雄厚，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强国。明成祖称帝后，派郑和出使“西洋”。从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船队7次下“西洋”，到达过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创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亚非海上交通线，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彰显了中国和平友好、和谐相处的文化精神。



郑和像

明成祖在位期间，还派陈诚三次出使中亚帖木儿帝国。使团从南京出发，经玉门关、新疆地区进入中亚，以丝绸、布帛等物馈赠当地，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这一时期，先后有几十个使团来往于中国和中亚地区。因元末战乱和割据一度阻塞的陆上丝绸之路，再次出现了“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

## 第二节 元明时期对新疆地区的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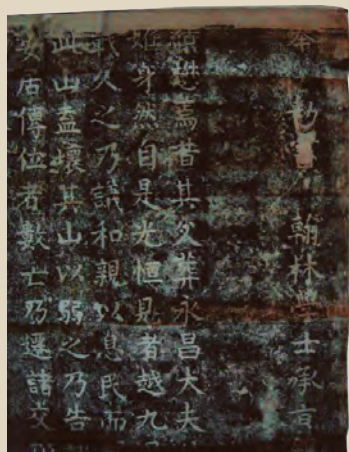
元明时期，中央政权通过设置军政管理机构、册封任命地方首领等措施，行使着对西域的管辖权。这也是汉代以后历代中央王朝对天山南北各地行使主权的延续和发展。

### 一、蒙古统一新疆地区及行省制度的确立

西辽后期，政治日趋黑暗，实力逐渐衰落，属部各族渴望摆脱其控制，这为蒙古进入西域创造了条件。1209年，高昌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自愿归附蒙古。1211年，活动在阿力麻里的哈刺鲁部（即葛逻禄）首领也率众归附了成吉思汗。1218年，成吉思汗派兵攻灭西辽。至此，天山南北各地皆归属蒙古，结束了唐末以

## 资料链接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翰林直学士虞集奉诏撰文立此碑。碑文收入《道园学古录》《元文类》等。1933年在甘肃武威发现原碑，正面汉文，背面回鹘文。碑文记述了高昌亦都护家族始终对中央王朝忠贞不渝，在跟随蒙古西征，平定叛乱中立下战功的史实。



来西域诸地纷争割据的混乱局面。“而今四海归王化，明月青天却一家。”<sup>①</sup>蒙古统一西域后，在天山南北设立各种军政管理机构和职官，行使对西域的管辖。

达鲁花赤的设置。达鲁花赤，蒙古语意为“镇守官”，是蒙古在各地设置的最高监治长官，负责“籍户口，收赋税，签发兵丁”。1223年，蒙古国在别失八里诸地相继设置达鲁花赤，以管理当地事务。成吉思汗赐畏兀儿人月朵失野讷都督印章，兼任独山城（今新疆木垒）达鲁花赤<sup>②</sup>，以表彰他同其父对发展当地经济的贡献。达鲁花赤的设置对蒙古管理西域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以后军政机构的设置打下了基础。

行尚书省的设置。元朝初期，仿照金朝制度，在个别地方设立行尚书省作为地方行政机构。1251年，元宪宗蒙哥在位期间，设立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同时设立了阿姆河行尚书省。这两个行尚书省的设置，反映了元廷对西域统治的进一步强化，奠定了蒙古统治西域军政管理机构的大致轮廓。这是行省制度第一次在西域出现，是中央政权对这一地区实施管辖的新举措，也是我国古代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重大变革。

其他军政机构的设立。1280年，元朝在高昌回鹘境内设北庭都护府<sup>③</sup>，作为管辖西域的最高军政机关。1282年，在伊犁设阿力麻里元帅府，统领天山北路。1283

① （元）耶律楚材著，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赠辽西李郡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3页。

② （明）宋濂：《元史·哈刺亦哈赤北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047页。

③ （明）宋濂：《元史·世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28页。

## 史料回放

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别失八里畏兀城子里军站事。十七年，以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十八年，从诸王阿只吉请，自大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二十年，立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二十三年，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十（失）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以总之。

——《元史·地理志》

宣慰司最早见于金朝，元朝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是一级地方军政机构。《元史》记载：“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

年，在别失八里、和州等处设宣慰司<sup>①</sup>，分别统辖南北疆军政事务，使新疆地区行政机构组织完全同中原等地一致。1286年，元朝派兵千人屯田别失八里，并设别失八里元帅府<sup>②</sup>，统领天山南路。1295年，元朝设置北庭和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分别镇护天山南北各地<sup>③</sup>，同年又设置西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sup>④</sup>。这些军政机构的设置，使得新疆地区与中原等地区的一体化程度得到显著加强。

元朝为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管辖，除设置军政机构外，还设置了很多水、陆驿站，以加强同内地的联系；建交钞提举司、交钞库，以管理元朝货币在新疆地区的发行和流通；设提刑按察使司，主理司法诉讼；设哈赞（zàn）忽咱、哈刺火州（今新疆吐鲁番）总管府等，以加强户籍和赋税的管理。这些机构的设置，反映了新疆地区同中

## 资料链接

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

——《元史·地理志》

元朝建立了遍布全国的驿站，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① （明）宋濂：《元史·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69页。

② （明）宋濂：《元史·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69页。

③ （明）宋濂：《元史·百官志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09页。

④ （明）宋濂：《元史·成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95页。

央之间密切的关系，对天山南北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 二、察合台后裔建立的地方政权

察合台汗国是在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察合台的封地最初领有西辽旧地，包括天山南北及今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地区，统治中心在阿力麻里。察合台汗国与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始终保持着臣属关系，汗国首领的承嗣由大汗委派任命，奉大汗为宗王，大汗视边藩诸王为藩臣。元朝建立以后，察合台汗国仍与中央保持着臣属关系。也先不花、怯别等察合台汗王，都向元朝遣使入贡。1312年，“西北诸王也先不花等遣使以橐驼、方物入贡”<sup>①</sup>。1327年，“遣欢赤等使诸王怯别等部”<sup>②</sup>。1331年，“西域诸王秃列帖木儿遣使献西马及葡萄酒”<sup>③</sup>。可见，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始终与元朝保持着通使、朝贡的各种交往。

1347年，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东察合台汗国（1347—1570）以阿力麻里为中心，统治地区包括今伊犁河流域、喀什、吐鲁番等地；西部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统治河中地区，后演变为帖木儿帝国。东察合台汗国后期，内讧不断，局势动荡，最



① （明）宋濂：《元史·仁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51页。  
② （明）宋濂：《元史·泰定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81页。  
③ （明）宋濂：《元史·文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94页。



终分为东西两部：1514年，察合台的后裔赛依德在叶尔羌（今新疆莎车）称汗，建立了叶尔羌汗国（1514—1680），统治着西部地区；占据汗国东部地区的是东察合台汗国的残余势力，以今吐鲁番、哈密为中心，1570年被叶尔羌汗国消灭。

叶尔羌汗国存在了166年，历11代汗王，1680年被准噶尔部灭亡。无论东察合台汗国还是叶尔羌汗国，都是中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都臣属于明朝，与明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 三、哈密卫的设立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随即着手统一西域，在嘉峪关和哈密之间先后建立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蒙古、沙州等六个卫，以此支持管理西域事务。1391年，因哈密蒙古宗王时常阻断西域使臣商旅来往明朝，明太祖下令征讨哈密城。1404年，明朝封哈密王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哈密归属明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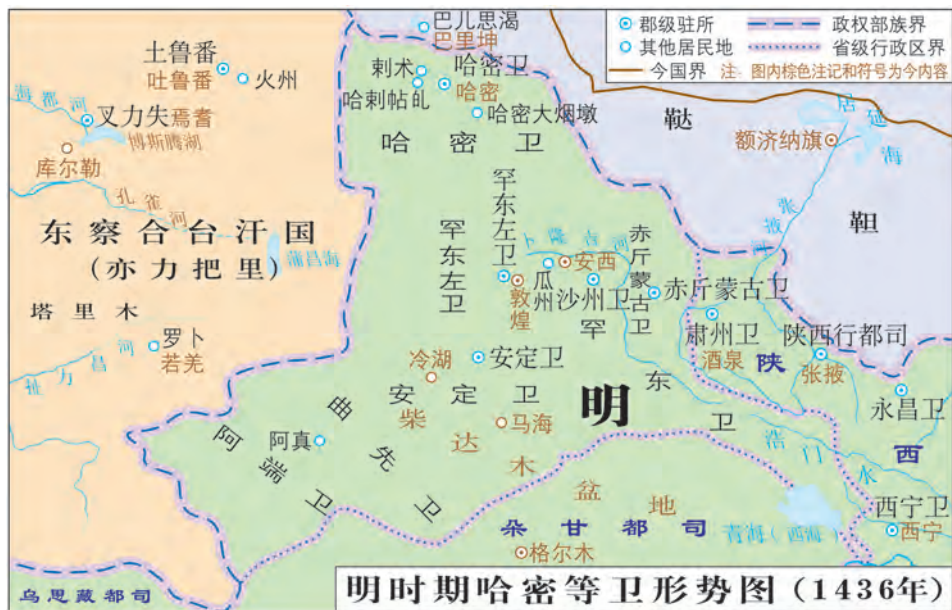
1406年，明朝设立哈密卫，自此哈密正式成为明朝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卫所。哈密卫的军政首领是忠顺王，由地方少数民族首领担任，是明朝对这一地区进行统治的代理人。忠顺王的产生，须经过本地官吏推荐，并由明朝批准。同时，朝廷又委派汉人辅佐忠顺王。哈密卫的职责是：奉朝廷指令，代表朝廷管理当地日常事务；把守西部大门；保护东西交往的使节、商旅、僧侣的来往安全。哈密卫的建立，延续了中原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由是诸番唇齿之势成，而华夷内外之力合，边境宁谧余八十年。”<sup>①</sup>

明朝统辖西域的另一措施，是册封各地的首领为王。哈密、别失八里、亦力把里、吐鲁番和瓦剌等地方首领都由朝廷册封，并颁发印信。明成祖在位时期（1403—1424），曾册封蒙古瓦剌部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并赐以驼钮金印。后因瓦剌部内讧，明朝所赐金印丢失。于是，1446年明朝重新赐予瓦剌也先太师驼钮金印<sup>②</sup>。1492年，“诏哈密故忠顺王脱脱近属侄孙陕巴，袭封忠顺王，给赐金印、冠服”<sup>③</sup>。明朝还授予西域各地首领以都督的官职“辅守疆土”，以后又封免力帖

① 薄音湖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许进·平番始末》第7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8页。

② 官修：《明英宗实录》（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896页。

③ 官修：《明孝宗实录》（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157页。



木儿为忠义王“赐印诰玉带”，封孛罗帖木儿为忠顺王“赐诰印”<sup>①</sup>。元人欧阳玄也曾记载：“高昌王有印，曰‘诸天敬护护国第四王印’，即唐所赐回鹘印也。”<sup>②</sup>这说明高昌王对中央政权管辖的认同。清朝初年，土尔扈特蒙古从伏尔加河流域东归时，其首领渥巴锡见到伊犁将军，“并献伊祖所受明永乐八年（1410）汉篆敕封玉印一颗”<sup>③</sup>。瓦剌早在明成祖时就受到中央的册封，说明瓦剌人是明朝的臣民，这颗大印一直被土尔扈特人保存了360多年，表明其对中央政权的高度认同。另外，明朝还任命哈密头目、火州头目、瓦剌头目、亦力把里使臣等为本地的都指挥、都督佥事、指挥、千百户等官，管理本地的行政事务。地方官的后代可以继承职位，但要经朝廷任命才有效。1428年，“命亦力把里遣来使臣法黑儿者罕为都指挥佥事，别帖木儿为指挥佥事”<sup>④</sup>；1430年，“命瓦剌顺宁王脱欢所遣使臣脱火歹为都指挥佥事”<sup>⑤</sup>；1446年，“升哈密使臣副千户阿都剌为指挥佥事，伯火只为正千户。命指挥同知兀马儿火者子绰刺克袭职”<sup>⑥</sup>。明朝通过这些受册封和任命的首领管理西域的行政事务。

① （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13页。

② （元）欧阳玄著，汤锐校点整理：《欧阳玄全集·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2页。

③ （清）七十一、林则徐撰：《清抄本林则徐等西部行纪三种·西域闻见录·土尔扈特投诚纪略》，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版，第178—179页。

④ 官修：《明宣宗实录》（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81页。

⑤ 官修：《明宣宗实录》（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553—1554页。

⑥ 官修：《明英宗实录》（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735页。

叶尔羌汗国时期，1570年马黑麻被任命为吐鲁番总督。他遣使者向明朝“求贡”，希望恢复与明朝的贸易往来，得到明朝的特准。葡萄牙人鄂本笃曾在叶尔羌汗国游历两年，在其著作中写道：叶尔羌汗国组织前往明朝的商队领袖“被赐与管辖全程旅客的皇权”。鄂本笃到达肃州时，看到这里有许多来自哈实哈儿（今新疆喀什）的商人。“这些商人中有很多已在此地娶妻，成家立业，因此他们被视为土著，再也不回他们的本土。”“他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服从中国。”“王付以全权。在全途间，可以管辖商人。”<sup>①</sup>西域各地统治者视向明朝进贡为“金路”<sup>②</sup>，源源而来。这些都表明，朝贡贸易确立了明朝在西域的政治威慑和影响力，是明朝与叶尔羌汗国关系史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叶尔羌汗国对中央政权认同的象征。

### 第三节 蒙古、畏兀儿等民族的分布与融合

元明时期，我国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使各民族长期比邻而居，互相影响，民族融合再现高潮。西域的众多民族涌入中原等地区与汉族交错杂居，汉族也迁居到周边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增添了新成员，民族风貌更加多姿多彩。在这一时期，大量汉人、蒙古人、女真人、党项人等相继进入新疆地区，带来了不同民族的生产技术、文化观念以及社会风俗，在交流融合中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 一、蒙古、畏兀儿、汉等民族在新疆地区的活动

蒙古族最初居住在今额尔古纳河一带，8世纪时开始西迁到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境内）流域，后来逐渐散布到蒙古高原广大地区。13世纪初，随着蒙古汗国的建立，成吉思汗把征服的地方分封给四个儿子。长子术赤分得钦察草原，次子察合台分得伊犁河流域、河中地区及焉耆以西的整个地区，三子窝阔台分得今新疆塔城、阿勒泰地区和蒙古高原西部，幼子拖雷继承成吉思汗原来的领地，即蒙古

① [意大利]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9、560页。

② （明）王琼著、张志江点校：《晋溪本兵敷奏·为夷人供报虏情事》，《山右丛书·二编》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83页。

从古至今，新疆地区一直生活着很多民族。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新疆地区各民族迁徙往来频繁，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民族的大量人口进入，都是新疆的共同开拓者。各民族在新疆地区经过长期诞育、分化、交融，形成了血浓于水、休戚与共的关系，都为开发、建设、保卫新疆作出了重要贡献，都是新疆的主人。新疆地区既是各民族的家园，更是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组成部分。

高原本部。新疆地区因此分布着大量的蒙古人。

元末明初，蒙古族的另外一支瓦剌部势力逐步强盛。15世纪以后，瓦剌部势力扩展到今准噶尔盆地及阿尔泰山一带，并与明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7世纪以后，瓦剌部蒙古又被称为卫拉特蒙古或西蒙古。

元代，维吾尔族先民在汉文史籍中被称为“畏兀儿”，分布于嘉峪关以西及天山以南的广阔地域内，主要聚居于哈密、吐鲁番、别失八里、火州、柳城（今新疆鄯善县鲁克沁镇）、于阗、哈实哈儿等地。

汉人在元朝统一后大量进入新疆地区。蒙古军队西征时，征发大量汉人随军征战，其中不少成为驻守当地的军官和官吏。据长春真人丘处机记述，当时别失八里城居住着畏兀儿人，而当地从事音乐伎艺的都是“中州人”<sup>①</sup>，即中原的汉人。在阿力麻里城中，畏兀儿人与汉民杂居，习俗渐染，与中原地区极为相似。忽必烈继位后，又征调大批汉军、新附军以及农民和工匠到新疆地区，为当地开发注入了新的活力。

哈萨克人分布在我国新疆地区西北部和中亚广阔的地域，各部落按系谱分为三个“玉兹”，可汗任命其子弟或宗亲担任玉兹的首领。哈萨克人以畜牧业为主，同时存在部分农业和狩猎业，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柯尔克孜在元朝称“乞儿吉思”“吉利吉思”，主要活动在阿尔泰山以北的叶尼塞河上游一带。17世纪初，随着沙俄侵略势力向叶尼塞河流域的推进，柯尔克孜人被迫向西南方向迁徙，大部分迁到天山西部伊塞克湖地区。后来，一部分又从伊塞克湖迁往中亚塔什干、费尔干纳盆地及附近，成为今天中亚吉尔吉斯人的主要来

<sup>①</sup> （元）李志常著，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吉利吉思者，初以汉地女四十人，与乌斯之男结婚，取此义以名其地。南去大都万有余里。相传乃满部始居此，及元朝析其民为九千户。其境长一千四百里，广半之，谦河经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东北有水曰玉须，皆巨浸也，会于谦，而注于昂可刺河，北入于海。俗与诸国异。其语言则与畏吾儿同。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颇知田作，遇雪则跨木马逐猎。土产名马、白黑海东青。

——《元史》第六十三卷

源；另一部分迁到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一带及其附近，成为今天新疆地区柯尔克孜人的主要来源。

## 二、蒙古与畏兀儿等民族的交融

元明时期，新疆地区各民族进一步融合，蒙古人尤其是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基本和畏兀儿人融为一体，为畏兀儿补充了新鲜血液。

察合台汗国时期，西域的蒙古人最初仍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主要活动于山谷、草原。至元末明初，大量蒙古人受城市定居生活方式的影响，逐步从游牧转向定居，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部落社会组织逐渐瓦解，在与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当地畏兀儿人长期共同生活中，相互影响，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蒙古人原来信仰萨满教和藏传佛教。1347年，察合台的后裔秃黑鲁帖木儿在阿克苏被拥立为汗，建立了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即位后接受伊斯兰教，并在王公贵族中推行。据记载，当时16万蒙古人被迫改信了伊斯兰教。此后，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高压下，大量蒙古人都改信了伊斯兰教。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东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最终从游牧走向定居，从畜牧业转为农业，生产、生活、语言、文化、风俗、宗教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来大都融合于畏兀儿人之中。

元明时期，在新疆地区生活的大量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等，由于长

期间居杂处，也逐步融入到蒙古人、畏兀儿人中去了。西辽灭亡后，“其国人无几，衣服悉回纥也”<sup>①</sup>。

## 第四节 元明时期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

元明时期，全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元朝统治者“以汉法治中原”，依照中原王朝的统治方法，实行了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农业、手工业生产逐渐恢复，商业发展迅速，商品流通活跃，海外贸易的扩展范围比前朝大增。明朝统治者建立了严密的黄册、里甲制度，使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明朝的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也出现了新的发展高潮，海外贸易繁荣。元明的空前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及商品贸易的发达，对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元朝加大了在新疆地区屯田的力度，并在这里计田收税。元朝还设立了大量驿站，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创造了条件。明朝时期设立哈密卫，保护东西方往来的商旅，派陈诚出使西域，加强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的联系。同时，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等地方政权也与明朝保持着密切的朝贡贸易。

### 一、元朝时期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就

蒙古统一西域后，社会逐渐安定。成吉思汗在位时，将今新疆和中亚部分地区分封给其子察合台和窝阔台，封地隶属于中央管理，首领由皇帝指定。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窝阔台的后裔海都和察合台的后裔都哇掀起了长达30多年（1268—1303）的叛乱，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平定叛乱之后，为了恢复并发展当地经济，元朝开展大规模屯田，并积极发展手工业和商业。

屯田。元朝统治者认为，屯田是“养兵息民之要道”，因此在元朝初年即开始在全国各地屯田。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朝在枢密院下专门设立了左右翼屯田万户府，“分掌斡端、别十八里回还汉军，及大名、卫辉新附之军，并迤东回军，合为屯田”<sup>②</sup>。

元朝在新疆地区的屯田主要集中于别失八里、斡端（今新疆和田）、可失合儿

① （金）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北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7—168页。

② （明）宋濂：《元史·百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64页。

(今新疆喀什)、阾鄯(shé chán)(今新疆且末)、合迷里(今新疆哈密)等地。1281年,“命万户綦公直分宣慰使刘恩所将屯肃州汉兵千人,入别十八里”<sup>①</sup>;1288年,“命斡端戍兵三百一十人屯田”<sup>②</sup>;1287年,“发河西、甘肃等处富民千人往阾鄯地,与汉军、新附军杂居耕植”<sup>③</sup>,“以别十八里汉军及新附军五百人屯田合迷玉速曲之地”<sup>④</sup>。

元代在新疆地区的屯田以军屯为主,也有民屯。军屯和民屯往往交织在一起,如阾鄯地区的屯田就是“汉军、新附军杂居耕植”。在新疆地区从事屯田的,包括汉人、畏兀儿人、蒙古人、党项人、契丹人、女真人等诸多民族。

屯田成效较显著。哈刺亦哈赤北鲁、月朵失野讷父子在独山城屯田几年后,当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返还时,看到这里已是“田野垦辟,民物繁庶”的景象。屯田斡端的宣慰使刘恩,于至元二十年(1283)即向朝廷“进嘉禾,同颖九穗、七穗、六穗者各一”<sup>⑤</sup>。屯垦也获得粮食丰收,甚至在至元八年(1271),元朝即“敕往畏吾儿地市米万石”<sup>⑥</sup>。1288年,“合迷里民饥,种不入土,命爱牙赤以屯田余粮给之”<sup>⑦</sup>。这些都说明新疆地区通过屯田已获得数量比较可观的储粮。马可·波罗经过新疆地区,在今莎车看到的是“居民百物丰饶”,在和田地区看到的是“百物丰饶,产棉甚富,居民植有葡萄园及林园”<sup>⑧</sup>。

征收赋税。元太宗元年(1229)规定,“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麻合没的滑刺西迷(又译为“牙老瓦赤”)主之”<sup>⑨</sup>。元朝在新疆地区以丁为单位征收赋税与在中原地区以户为单位征收赋税稍有不同,但两者的性质基本一致,都是征收人头税。1279年,元朝“命畏兀界内计亩输税。以各道按察司地广事繁,并劝农官入按察司,增副使、佥事各一员,兼职劝农水利事”<sup>⑩</sup>。这是元朝在新疆地区税制的一

① (明)宋濂:《元史·世祖纪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2页。

② (明)宋濂:《元史·世祖纪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4页。

③ (明)宋濂:《元史·世祖纪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03页。

④ (明)宋濂:《元史·世祖纪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02页。

⑤ (明)宋濂:《元史·世祖纪九》,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7页。

⑥ (明)宋濂:《元史·世祖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页。

⑦ (明)宋濂:《元史·世祖纪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7页。

⑧ [意大利]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90、92页。

⑨ (明)宋濂:《元史·太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0页。

⑩ (明)宋濂:《元史·世祖纪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0—211页。

个重大变化，即改变了先前以“丁计”的做法，实行“计亩输税”。

元朝还根据新疆地区的实际情况予以减免赋税。如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因“合刺所部和州等城为叛兵所掠”，“仍免其民差役三年”<sup>①</sup>。同年七月，因“秃古灭军劫食火拙畏吾城禾，民饥”，“仍免其赋税三年”<sup>②</sup>。泰定帝时期，于泰定元年（1324）在新疆地区设立了哈赞忽咱一职，“以忽咱某丁为哈赞忽咱，主西域户籍”<sup>③</sup>。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元朝在新疆地区设立一些发展手工业的机构。早在元太宗统治时期（1229—1241），“收天下童男童女及工匠，置局弘州。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及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命镇海世掌焉”<sup>④</sup>。元朝统治者、贵族偏爱织锦中的金锦，即在织物中加入金线的锦，这种金锦当时被称为“纳失失”。为了满足需要，元朝在西域设立忽丹八里局、别失八里局。“别失八里局，秩从七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掌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至元十三年（1276）始置。忽丹八里局，大使一员，给从七品印。”<sup>⑤</sup>此外，别失八里局还掌管手工染织业生产，“别失八里局，官一员”<sup>⑥</sup>。在今新疆吐鲁番，也设有织工场。河南密县人陈福，在山西太原入织工籍，“复被徙哈喇和卓十有五年”<sup>⑦</sup>。各民族工匠共同生产、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也促进了新疆地区手工业的发展。

新疆地区很早就有葡萄种植业，当地人还用葡萄酿造葡萄酒。元人熊梦祥曾详细记录了高昌地区葡萄酒的酿制过程。元朝宫廷中饮用的葡萄酒来自全国许多地区，“酒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刺火者，有平阳、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刺火



高足青花瓷碗 出土于新疆霍城阿力麻里古城遗址

① （明）宋濂：《元史·世祖纪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22页。

② （明）宋濂：《元史·世祖纪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25页。

③ （明）宋濂：《元史·泰定帝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46页。

④ （明）宋濂：《元史·镇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964页。

⑤ （明）宋濂：《元史·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49页。

⑥ （明）宋濂：《元史·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51页。

⑦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同恕·陈君墓志铭》第1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页。



## 资料链接

元人熊梦祥在《析津志辑佚》中记录了高昌地区葡萄酒的酿制过程：“葡萄酒，出火州穷边极陲之地。酝之时，取葡萄带青者。”首先要先用砖石砌一些嵌入地中类似大瓮的池子，“其瓮可容数石者。然后取青葡萄，不以数计，堆积如山，铺开，用人以足揉践之使平，却以大木压之，覆以羊皮并毡毯之类，欲其重厚，别无曲药”。每十天半月后检查一次，直至瓮中都是已成液状的醇香葡萄酒，“乃取清者入别瓮贮之，此谓头酒”。如此反复三次，“故有头酒、二酒、三酒之类。直似其消尽”。其中的“上等酒，一二杯可醉人数日”。

者。田地酒最佳”<sup>①</sup>。这里的哈刺火即今吐鲁番，田地即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郡下的田地县所在地。元代时的宫廷御酒虽来自各地，但味道最好的为哈刺火所产之酒，最佳的为田地酒，充分反映出新疆地区葡萄酒酿造业技术的发达。正因为高昌所产葡萄酒质量最为上乘，所以不但是优良商品，也是上等贡物。高昌地区向元廷进贡葡萄酒的制度一直沿袭到元朝末年。泰定元年（1324）二月，“高昌王亦都护帖木儿补化遣使进葡萄酒。”<sup>②</sup>

元朝疆域辽阔，国家的大一统促进了统一货币的流通和使用。元朝发行的纸币，如中统元宝交钞和至元通行宝钞，都在天山南北各地流通。元朝还在西域设立交钞提举司，主管钞币的印制和发行，如至元十七年（1280）三月，“立畏吾境内交钞提举司”<sup>③</sup>。至元二十年（1283），又“立畏兀儿四处站及交钞库”<sup>④</sup>。交钞库主要负责钞币的贮藏。这



元代至元通行宝钞  
出土于新疆吐鲁番

① （元）忽思慧著，张秉伦、方晓阳译注：《饮膳正要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页。

② （明）宋濂：《元史·泰定帝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44页。

③ （明）宋濂：《元史·世祖纪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23页。

④ （明）宋濂：《元史·地理志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67页。

些机构专门管理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促进了当地商业发展。

元朝还专门在新疆地区设立集市进行贸易。1284年，“从迷里火者、蜜刺里等言，以钞万锭为市于别十八里及河西、上都”<sup>①</sup>。当时畏兀儿人有不少到中原地区经商贸易者，如“回鹘有田姓者，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sup>②</sup>。马可·波罗途经喀什噶尔时说，这里的“居民为工匠商贾……有不少商人由此地出发，经行世界贸易商货”<sup>③</sup>。

## 二、明朝时期新疆地区游牧业向农业的转变

蒙古族初至西域时还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主要活动于山谷、草原。如至元六年（1269），窝阔台汗、察合台汗和钦察汗会聚于塔刺思草原召集忽里台大会时，曾约定蒙古诸王及其部落、军队“将驻于山区和草原，将不进入城郭之地，也不在农耕之地放牧牲口，不对农民提出过分要求”<sup>④</sup>。因此，西域的蒙古人长期保持着游牧的生活方式。直至15世纪初，明朝使臣陈诚到达别失八里时，看到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马哈木（又译为马黑麻，1408—1415年在位）的部众，仍然是“不建城郭宫室，居无定向，惟顺天时，逐水草，牧牛马以度岁月，故所居随处设帐房，铺毡褥，不避寒暑，坐卧于地”，而其饮食则“惟肉酪，间食米面，希有菜蔬，少酿酒醴，惟饮乳汁。不树桑麻，不务耕织，间种稂麦”<sup>⑤</sup>。当时的东察合台汗国境内，“惟鲁陈（今新疆鄯善县鲁克沁镇）、火州、土尔番、哈石哈（今新疆喀什）、阿力马力（今新疆霍城）数处，略有城邑民居”<sup>⑥</sup>。西班牙人克拉维约出使中亚期间（1403—1406），见到当时的察合台蒙古人“至今仍过游牧生活，终年居于帐幕之内；冬夏迁徙各地，常择一安全而易于防守之地，张立帐幕……冬季，察合台人移

① （明）宋濂：《元史·世祖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65页。

② （南宋）赵珙著，李国强整理：《蒙鞑备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7编第2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

③ [意大利] 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④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页。

⑤ （明）陈诚著，周连宽校注：《西域番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2页。

⑥ （明）陈诚著，周连宽校注：《西域番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2—103页。

居到气候温暖之草地”<sup>①</sup>。直至叶尔羌汗国前期及中期，蒙古人大体都保持着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他们主要从事游牧，仍以部落组织形式出现。部落成员平时放牧，战时出征。

在元朝之前，天山南北就有相当规模的农业。元朝统治时期，新疆地区的农业也有了较大发展。至元末明初，汗国的统治者不再满足于简单质朴的游牧生活，而是逐渐趋向于农业定居生活。东察合台汗国的歪思汗统治时期（1417—1432），歪思汗曾在吐鲁番亲自浇灌土地，自给口粮。<sup>②</sup>克拉维约也说，察合台蒙古人“夏季多居于近河滩而平坦之地，在该地播种麦、棉，栽培瓜类”<sup>③</sup>。这说明察合台蒙古人已经开始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过渡。

随着蒙古人由游牧生活方式向农业定居生活方式的过渡，氏族部落组织形式逐渐解体，到叶尔羌汗国晚期，大批蒙古人融入畏兀儿人之中，定居并从事农业生产成为他们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叶尔羌汗国时期，叶尔羌、和阗地区已成为重要的农业地区。不过，直到清朝统一新疆地区之前，天山南北地区的农业总体上是粗放的，技术较落后，广种薄收。依然使用木辕铁铧、二牛抬杠、坎土曼、镰刀、木叉等简单的农业生产工具，还用手撒播种子，缺乏精耕细作，导致粮食产量低，农业发展缓慢。叶尔羌汗国商业比较发达，尤其是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密切。

### 三、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密切的经济交流

元代，草原丝绸之路得到大规模拓展。蒙古西征时，“金山南大河驿路”<sup>④</sup>的畅通，极大地缩短了原有交通线的距离，东西交往更加便捷。为了维护和改善新疆地区同中原地区的交通线，元朝在环绕天山南北的交通道路上设立驿站，“星罗棋布，

---

① [西班牙] 克拉维约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02 页。

② 张权：《明清时期的西域民族》，载徐文堪编：《现代学术精品精读·西域研究卷》（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58 页。

③ [西班牙] 克拉维约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02 页。

④ （元）李志常著，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1 页。

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sup>①</sup>，对于推动这一时期东西方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新疆地区同中原诸地保持了密切的商业往来。哈刺火州各地商业活动十分发达，土地、葡萄园租赁买卖十分盛行，借贷、债务契约文书制度也较为完善，反映了当时繁盛的商业贸易活动。20世纪初，在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很多13世纪的抄本，其中一些是用回鹘文雕版印刷的。这些抄本的中缝印有汉字页码和一些汉人工匠的姓名，证明当时这一带的雕版印刷是由汉人工匠制作或传授的。同时，这一时期东西方商人的流动更加频繁。这种民族间的迁徙和流动，使各民族有了更广泛、更密切的接触，进一步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

中原地区传统纺织原料主要是丝和麻，宋元时期，棉花的种植才逐渐推广。棉花传入中原地区有陆海两道，陆道传自新疆地区。《农桑辑要》记载：“木绵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木绵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sup>②</sup>这里的木绵即非洲棉，也称草棉，它从新疆地区经河西走廊传入今陕西一带。

明朝时期，新疆各地同中原的朝贡关系和经济交流非常频繁，两地交往十分密切。1391年，东察合台汗国第三任可汗黑的儿火者派遣千户哈马力丁向明太祖朱元璋朝贡，明太祖也遣使回报，并写信给黑的儿火者，希望“通好往来，使命不绝”<sup>③</sup>。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明朝一次就从西域购买4 000多匹马。阿黑麻汗在位时，与明朝发生冲突，阿黑麻汗攻占哈密，扣押明朝所册封的哈密忠顺王。明朝最后以“闭嘉峪关，永绝贡道”的办法对付东察合台汗国，使其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于是新疆各地“胥怨阿黑麻”。阿黑麻汗只好于1497年释放了哈密忠顺王，并向明朝表示悔过，请求重新开通贸易。<sup>④</sup>东察合



大明通行宝钞 新疆博乐征集

① （明）解缙等辑：《永乐大典·经世大典·站赤门》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192页。

② （元）大司农司编撰，缪启愉校释：《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页。

③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西域传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607页。

④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西域传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532页。



## 资料链接

其马市为夷货流通之府，胡汉之人，胥仰藉焉。抢掠所获不足以当市易之利，夷人以市为金路，惟恐失之。

——《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二十二

马市：明代与边疆少数民族互市的一种固定场所，因以交换或收买马匹为主，故名。马市由来已久，汉在边境设关市，贸易项目即有牛马。唐、宋、元等朝皆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马市交易。明承此制，多设马市。

台汗国以“朝贡”的名义，把新疆地区的马、羊、骆驼等畜产品以及玛瑙、回回青、玉石等土特产品输往中原地区，而明朝则以“回赐”的方式，把钞币、绢、彩缎、瓷器等运往新疆地区。新疆发现的“大明通行宝钞”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原和新疆地区密切的经济交往。此外，双方还设有“互市”。明朝还在兰州、凉州、甘州、宁夏、大同等地设置“马市”，以便新疆地区与中原等地的贸易。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新增药物374种，其中近百种药物是元明时期由新疆地区引进的。如巴旦杏，“出回回旧地，今关西诸土亦有。树如杏而叶差小，实亦尖小而肉薄。其核如梅核，壳薄而仁甘美。点茶食之，味如榛子。西人以充方物。气味甘、平、温、无毒。主治止咳下气，消心腹逆闷”<sup>①</sup>。朝贡和贸易的频繁进行，密切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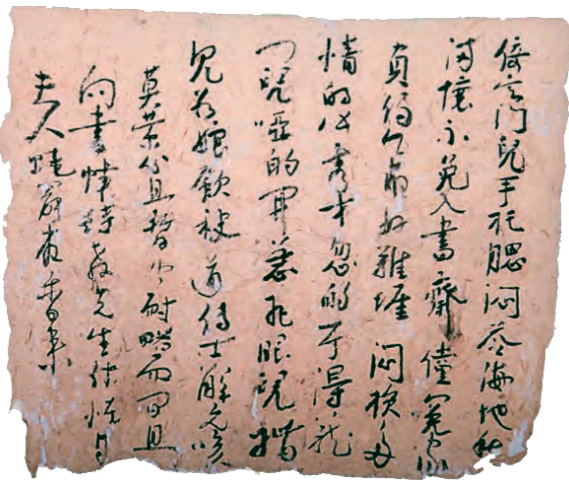
## 第五节 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元明时期，统一国家的建立，多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交流融合，为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沃土。这一时期，新疆地区语言文字、文学、翻译、史学、音乐、舞蹈、建筑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同时，大批畏兀儿等少数民族移居内地生活，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名家辈出，成就斐然，为唐宋以来中华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涵。

<sup>①</sup>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4页。

## 一、新疆地区多元文化的繁荣

元明时期，新疆地区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明沃土中多姿多彩、枝繁叶茂。1986年，新疆且末县苏伯斯坎遗址出土了《西厢记》中《仙吕调·赏花时》的元代抄本残页，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种由元代人手抄的《西厢记》。抄本残存“倚定门儿手托腮……等夫人烧罢夜香来”<sup>①</sup>9行文字，出自我国古代的经典爱情作品《董解元西厢记》。《董解元西厢记》流传到塔里木盆地，说明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文化的互动交融，也彰显了元明时期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的深远影响。



《西厢记》手抄本残页  
出土于新疆且末苏伯斯坎遗址

14世纪初，古代伊朗人拉施特在其著作中记录了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情况：“在乞台地区（当时泛指中国西北部）、秦（当时泛指中国北部中原地区）、摩秦（当时泛指中国南部地区）、新罗、女真、哈喇乞台（指西辽政权）、畏兀儿地区……所有这些地区都研习乞台人（即汉人）的科学著作，尽管他们的文字、宗教各异。例如畏兀儿人语言与文字虽然与之有差异，但他们从乞台人的著作中了解了大量的天文学知识，使用十二种特殊动物名称（即十二生肖）命名十二个年份，这正是乞台族的习俗。”<sup>②</sup>这说明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

这一时期，新疆地区通行的语言文字有汉文、回鹘文、蒙古文、古叙利亚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察合台文等。由于回鹘人大多熟悉汉文、汉人大多都熟悉回鹘文，回鹘人在译经时，往往直接使用汉文译写常见的术语。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涌现出一批回鹘佛学大师，必兰纳识里、安藏等还参加了汉文《大藏经》的整理工作。蒙古人原无文字，成吉思汗灭蒙古乃蛮部时，俘获在乃蛮部任职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帝曰：‘汝深知本国文字乎？’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称旨，遂命教太子

① 凌景埏校注：《董解元西厢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② 时光校注：《〈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页。

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sup>①</sup>。塔塔统阿依照回鹘文创制了蒙古文。多语并重推动了各民族文化频繁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勃兴和社会进步。

## 二、畏兀儿人的内迁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融

元朝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促成了这一时期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各民族之间频繁迁移及文化的广泛交流，就其范围和内容来讲，较之以往有许多开拓和创新。

崇尚儒学理念。这一时期，元朝在西域军士集中的军卫中设立儒学教育，使得许多西域军士及其后裔逐渐熟悉中原文化。同时，元代还有大批畏兀儿人等东迁中原，尊崇儒学，学习汉文化已蔚然成风。如今天湖南桃源县的维吾尔族，就是高昌回鹘的后裔。成吉思汗时畏兀儿人哈勒率军士征战，因战功显赫，哈勒的后裔在元大都世代为官。明太祖朱元璋时，起用哈勒的后裔平叛，此后，这些畏兀儿人世代定居在桃源县境内，逐步发展为今天桃源县的维吾尔族。元代畏兀儿人定居中原以后，学习使用汉语，有的参加科举考试并被录用为各级官员，涌现了一批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农学家、翻译家等。很多精通汉文化的畏兀儿人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学于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sup>②</sup>，“读书属文，学为儒生”<sup>③</sup>，效仿华风，习染汉俗，世居中原，成为典型的“士人”。他们助推新疆各民族文化出现了一个发展高峰。前去中原地区的畏兀儿人以高昌偃氏家族、廉希宪、阿鲁浑萨理等为主要代表，他们的儒学造诣高深。高昌偃氏家族具有高深的汉文化修养，“高昌偃哲笃世南以儒业起家，在江西时，兄弟五人同登进士第，时人荣之”<sup>④</sup>。畏兀儿文学家、史学家廉希宪（1231—1280），因“笃好经史，手不释卷”，精通儒学，被元世祖忽必烈尊称作“廉孟子”<sup>⑤</sup>。阿鲁浑萨理通晓畏兀儿、藏、汉、蒙古等多种语言文字，忽必烈令其专门研习经史百家之学，

① （明）宋濂：《元史·塔塔统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048页。

②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吴澄·玉元鼎字说》第15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③ （元）赵孟頫著，任道斌点校：《赵孟頫集·薛昂夫诗集序》，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

④ （元）孔齐撰，庄敏、顾新点校：《至正直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⑤ （明）宋濂：《元史·廉希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085页。

他向忽必烈建议以儒术治理天下。葛逻禄人后裔乃贤留存诗歌较多，其诗文内容多以爱国爱民为主。针对倭寇的侵扰，乃贤发出了“日本狂奴扰浙东，将军闻变气如虹。沙头列阵烽烟黑，夜半鏖兵海水红”“何时尽伐南山竹，细写当年杀贼功”<sup>①</sup>的怒吼，表达对元朝抗倭将士无限钦佩之情。

翻译汉文典籍。这一时期，一批畏兀儿翻译家及翻译作品给元朝的文化带来了新气象。翻译家有迦鲁纳答思、阿鲁浑萨理、安藏等。安藏幼年即“孔释之书皆贯穿”，元世祖忽必烈时“译《尚书·无逸篇》《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通以献”<sup>②</sup>，深得元世祖赏识。天历元年（1328）十二月辛丑，元文宗“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宝慈殿”<sup>③</sup>，随后，高昌地区不少佛僧迁居内地弘扬佛法、翻译佛经。元代畏兀儿知名佛僧翻译家舍蓝蓝（1267—1331），把《法华经》《金光明经》翻译成回鹘文。

文学成果丰硕。元代畏兀儿人的文学，特别是诗词创作的丰硕成果，是对中华文化作出的另一重要贡献。大批畏兀儿文人学士因钻研汉文化并取得辉煌成就而著称于元代文坛，有作品传世的文学家、诗人多达二十余人。他们多生活在中原等地，精通儒家典籍，自愿慕效“华风”，以汉名为荣，用汉文创作，表达了个人丰

### 资料链接

#### 双调·新水令·皇都元日（节选）

元·贯云石

郁葱佳气蔼寰区，庆丰年太平时序。民有感，国无虞。瞻仰皇都，圣天子有百灵助。

【搅筝琶】江山富，天下总欣伏。忠孝宽仁，雄文壮武。功业振乾坤，军尽欢娱，民亦安居。军民都托赖着我天子福，同乐蓬壶。



贯云石像

① 杨镰主编：《全元诗·乃贤·送慈上人归雪窦追挽浙东完者都元帅四首》第48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页。

②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程矩夫·秦国文靖公神道碑》第1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页。

③ （明）宋濂：《元史·文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22页。



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为唐宋以来中华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涵。其中，贯云石尤为出类拔萃，其诗歌作品主要收录在《酸斋集》；其善于创作散曲，《双调·清江引》《正宫·小梁州》等颇为流传，在元代文坛占有重要地位。来自西域的萨都刺写有《念奴娇·登石头城》《满江红·金陵怀古》等诗词，其诗词直陈时事，多为现实主义优秀作品。这些创作都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学宝库。畏兀儿人偃玉立著有诗文集《世玉集》，是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佼佼者。

书画成就斐然。元代畏兀儿人善书法艺术者有贯云石、廉希贡、边鲁等。他们或工于狂草，或长于篆体，或楷、草、篆皆能得心应手。在书法艺术方面最有成就的盛熙明，来自今新疆库车，后迁居江西南昌，他“笃学多才，工翰墨，亦能通六国书”<sup>①</sup>，是元代研究汉书法艺术的大家。另外还有康里部的康里子山，其著名的作品有正楷碑刻《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

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撰写的《农桑衣食撮要》，是当时关于农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在我国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畏兀儿翻译家安藏不仅翻译了《尚书》《资治通鉴》等，而且将汉文医学典籍《难经》《本草》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sup>②</sup>进一步推动了中原医学在西域的传播。

### 资料链接

鲁明善，名铁柱，字明善，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人，元代畏兀儿农学家。其父迦鲁纳答思是通习多种语言的著名翻译家，元世祖忽必烈时由西域进入大都。鲁明善汉文化素养很深，著有《农桑衣食撮要》一书，总结了中原及西北地区各民族的生产经验，为我国农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① （元）陶宗仪著，徐永明、杨光辉整理：《陶宗仪集·书史会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页。

②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程矩夫·秦国文靖公神道碑》第1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页。

### 三、新疆地区文化对伊斯兰文化选择性吸收

伊斯兰文化作为外来文化，直到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地区以后，才对新疆各民族文化发生影响。尽管在特定阶段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始终是影响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发展的诸多要素之一。宗教对文化的影响方式，既有自愿接受的途径，也有通过文化冲突甚至宗教战争的强制方式。在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很大程度通过一种方式进入，这导致佛教文化时期创造的新疆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遭到严重破坏。伊斯兰文化传入新疆，新疆各民族文化既有抵制，更有选择性吸收和中国化改造，既没有改变属于中华文明的特质和走向，也没有改变属于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客观事实。在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之前，包括维吾尔族文化在内的新疆各民族文化早已在中华文化沃土中枝繁叶茂。

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是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明代畏兀儿著名音乐家、诗人阿曼尼莎汗整理的《十二木卡姆》，剔除了其中过多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借词，使木卡姆歌词从以往晦涩难懂的具有宗教色彩的宫廷诗词中摆脱出来。规整后的《十二木卡姆》更加成套化、定型化，共包括了170多首歌曲和舞曲、72首器乐间奏曲，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阿曼尼莎汗（1534—1567），明代音乐家、诗人，出生于新疆莎车县，拉失德汗的王妃。

## 第六节 以伊斯兰教、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

元明时期，各种宗教的关系一直比较和谐，明清之际出现了用宋明理学阐释伊斯兰教经籍的“以儒诠经”现象，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特点日趋鲜明。这一时期，新疆地区宗教继续呈现多元格局，萨满教、祆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景教、天主教等宗教比较活跃。14世纪中叶，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秃黑鲁帖木儿通过强制手段，将伊斯兰教推广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至16世纪初，新

新疆各民族文化源自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文明体系，而伊斯兰文化则源自7世纪的阿拉伯文明体系。从时间上看，中华文化比伊斯兰文化要早得多，伊斯兰文化直到9世纪末10世纪初才传入。从内容上看，这两种文明体系在哲学基础、价值观念等方面有很多差异。伊斯兰文化随着伊斯兰教传入才对新疆各民族文化产生影响，在此之前，包括维吾尔族文化在内的新疆各民族文化早已在中华文明沃土中枝繁叶茂，与伊斯兰文化没有同源关系。

疆地区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 一、伊斯兰教与佛教的并立

元明时期，新疆地区宗教最典型的特点是延续了以佛教和伊斯兰教并立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至16世纪初，又演变成以伊斯兰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佛教。元明时期，佛教在新疆地区依然兴盛。13世纪早期，丘处机一行人到中亚朝见成吉思汗，在别失八里受到畏兀儿贵族的款待，在宴席上“侍坐者有僧、道、儒”，在城里有龙兴西寺，寺内藏有佛书。在昌八刺城，其王畏兀儿“率众部族及回纥僧皆远迎……有僧来侍坐”<sup>①</sup>。鲁不鲁乞于1253年前往蒙古朝见蒙哥汗时，在西域也见到过不少佛教僧人，他在游记中详细描述了佛教徒的宗教仪式。<sup>②</sup>1420年，沙哈鲁派遣至明朝的使团中，画师火者·盖耶速丁记载了他们到达吐鲁番时见到的情景：“这个城镇的大部分居民……崇拜偶像。他们有极美丽的大偶像寺庙，其中有很多偶像，一些是新塑的，另一些是旧的。坛前有一尊他们称为释迦牟尼佛的大佛像。”<sup>③</sup>

① （元）李志常著，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0页。

② [法国]贝凯、韩百诗著，[美国]柔克义译注，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9页。

③ [波斯]火者·盖耶速丁著，何高济译：《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6页。

15世纪中叶，藏传佛教在天山以北的卫拉特蒙古人中已有传播。16世纪末，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卫拉特蒙古，并于17世纪初成为该部蒙古信仰的主要宗教，为新疆地区佛教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伊斯兰教。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在位时期（1347—1362）信奉了伊斯兰教，并强迫16万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14世纪中叶，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战争等强制手段，将伊斯兰教逐渐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

和哈密一带。秃黑鲁帖木儿统治时期占领了库车，1392年其子黑的儿火者武力攻占吐鲁番，1399年又发动了对哈密的战争。东察合台汗国通过一系列的宗教战争，迫使当地居民接受伊斯兰教，并对佛教寺院、佛像、佛经进行了毁灭性破坏。至16世纪初，新疆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并延续至今。

总之，元明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利用或教派间的争斗，曾经出现过宗教战争或教派冲突，造成社会剧烈动荡，但是从来没有改变过新疆地区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多种宗教吸收融合、平和包容的关系。元明时期的哈密信奉佛教，同时伊斯兰教在这里也开始流行。至1420年，哈密“城中建筑了一座宏伟的清真寺，面对着它，他们筑有一座规模很大的佛寺，其中有一尊大佛。它的左右有很多小佛。就在大佛前，立着一个艺术精美绝伦的十龄童子的铜像。庙宇墙上绘有技巧熟练的壁画和优美的彩色画”<sup>①</sup>。两大宗教场所相邻并立，生动地反映出当地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多种宗教的和谐共处、相互借鉴，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八思巴文佛经印本残页  
出土于新疆吐鲁番

## 二、多种宗教并存格局与中国化的发展

元明时期，统治者实行较为开明的宗教政策，新疆地区除了佛教和伊斯兰教外，还流行着萨满教、祆教、道教、景教、天主教等多种宗教，依然保持着多种宗教并

<sup>①</sup> [波斯] 火者·盖耶速丁著，何高济译：《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6—107页。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地区，与阿拉伯帝国兴起和伊斯兰教自西向东扩张有密切关系。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南部，并先后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喀喇汗王朝信奉伊斯兰教后，于10世纪中叶向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发动40余年宗教战争，11世纪初攻灭于阗，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结束了佛教在这个地区千余年的历史；第二次是14世纪中叶之后，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战争等强制手段，将伊斯兰教推广到新疆全境，强迫当地居民信仰了伊斯兰教。至16世纪初，新疆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并延续至今。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不是当时民众主动改信和转型，而是宗教战争和统治阶级强制推行的结果。虽然这种强迫并不影响人们今天尊重维吾尔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的权利，但它是一个历史真实。伊斯兰教既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的宗教，也不是唯一信仰的宗教。直到今天，仍有一些维吾尔族群众信奉其他宗教，也有许多人不信仰宗教。

存的格局。

萨满教。在蒙元时期，萨满教在新疆地区仍有大量遗存。据记载，蒙古西征时“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闻雷声，则恐惧不敢行师，曰天叫也”<sup>①</sup>。元代诗人张昱在一首诗中描述了高昌畏兀儿的风俗：“高昌之神戴羖（gǔ）首，仗剑骑羊势猛烈。十月十三彼国人，萝卜面饼贺神节。”<sup>②</sup>另一位元代文人欧阳玄也在诗中记载了高昌人的风俗和宗教信仰：“十月都人家百蓄……燔獐鹿，高昌家赛羊头福。”<sup>③</sup>这里所说的高昌之神头上戴的羖首即黑色的公羊首，高昌人崇拜“戴羖首”的神、在十月十三日以羊头作祭、以萝卜面饼祝贺神节习俗，都是畏兀儿人信仰萨满教的余存。16世纪初，萨满教与藏传佛教在瓦剌人中共存，至16世纪末，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瓦剌，萨满教的影响才日益消退。

袄教。元明时期，袄教逐渐消亡，但其影响仍保留在新疆地区各民族生活习俗

① （南宋）赵珙著，李国强整理：《蒙鞑备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7编第2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页。

② 杨镰主编：《全元诗·张昱·辇下曲》第4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3页。

③ （元）欧阳玄著，汤锐校点整理：《欧阳玄全集·圭斋文集卷之四·渔家傲南词并序》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中。如柯尔克孜族的先民在迎亲时，娶亲队伍每经过一个居民点，居民们都会出来烧堆火，让新郎新娘从火上跳过以示祝福；到新郎家门口时，新娘要跳过一堆火后才能进屋。蒙古族也保留着类似的习俗。

道教。在蒙元时期，新疆地区道教也很活跃，有相当一批汉人跟随成吉思汗西征进入新疆地区，其中不乏道教信众。长春真人丘处机到达别失八里时，看到这里的“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sup>①</sup>，说明这里的道士在服饰上已经本地化了，与中原地区道士的穿着有很大差别。到了明朝，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道教随之衰落。

景教。景教在元明时期与伊斯兰教和佛教共存，并且与其他宗教相互交融。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当时喀什地区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但“此地有不少聂斯脱利派之基督教徒，有其本教教堂”。13世纪末，在哈密附近地区“居民有三种，曰偶像教徒、曰回教徒、曰若干聂斯脱利派之基督教徒”<sup>②</sup>。除此之外，马可·波罗还介绍了叶尔羌、伊犁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院，这些景教徒与其他宗教信仰者混居一城，按照各自的宗教教规生活的情形。14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扩散，景教逐渐衰落，只存在于少数地区。景教在我国长期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佛教的文化元素。阿力麻里古城遗址出土的景教墓碑上，景教十字架图像模仿佛教造像，在其下有莲花承托。这种“十字+莲花”的十字架构图充分吸收了中国佛教艺术，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景教艺术模式，是景教艺术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标志之一<sup>③</sup>。

天主教。随着蒙古西征，天主教也在元代传入新疆地区。伊犁地区是天主教的重点传教之地，阿力麻里成为天主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中心。14世纪中叶，随着秃黑鲁帖木儿汗推行伊斯兰教，伊犁地区游牧民信仰了伊斯兰教，天主教在这一地区



景教墓碑 出土于新疆  
霍城阿力麻里古城遗址

① （元）李志常著，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② [意大利]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8、121页。

③ 姚崇新：《观音与神僧——中古宗教艺术与西域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49—253页。

逐渐淡出。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地区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与当地社会环境和民族传统文化适应和融合的过程，并呈现出新的地域特点和民族文化特征。

明末清初，伊斯兰教苏菲派在新疆地区传播过程中吸纳了当地流行的原始宗教、萨满教、袄教、佛教、景教等诸多因素，并进行掺杂糅合，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麻扎和麻扎朝拜。比如，有的朝拜者会在麻扎边插木枝，拴有各种颜色的布条，或在高杆上挂牛尾、羊尾等，反映了萨满教的遗俗；有些麻扎用动植物来命名；有些麻扎是由佛教圣地转化而来。可以说，麻扎朝拜是新疆地区古代先民对新疆多种宗教信仰的融合和延续。

元代，景教在回鹘部落广泛传播，并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杂糅了许多地方特点，深受伊斯兰教、佛教和萨满教影响。例如，在宗教仪式上，聂斯脱利教徒绝不在祈祷时合掌，而是把手伸向胸前，不立十字架。<sup>①</sup>在教义和形式上，元代回鹘景教也有所嬗变，融合了当地萨满教的因素。元代景教在回鹘地区传播时，吸收了当地回鹘的习俗与文化，这是景教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的体现。

### 学 习 思 考

1. 元明时期，中央政权通过哪些措施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
2. 以元明时期为例，论述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之基。
3. 元明时期有哪些宗教在新疆地区传播？它们的关系如何？

### 必 读 书 目

1. 韩儒林：《元朝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 南炳文、汤纲：《明史》上、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 曹大为等主编：《中国大通史》第16—19卷，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年版。

<sup>①</sup> [法国] 贝凯、韩百诗著，[美国] 柔克义译注，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8—249页。